

馆校合作模式下的 大遗址研学实践与思考 ——以临淄齐国故城为例

Practice and Thinking on the Field Trip of Complex Site Under the Museum School
Cooperation Mode: Taking the Ancient City of Qi in Linzi as an Example

于 焱

Yu Yan

(临淄区文物保护中心, 淄博, 255400)

(Linzi District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Center, Zibo, 255400)

内容提要: 馆校合作的博物馆研学活动已经发展了近二十年, 大遗址研学正在成为博物馆研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临淄齐国故城遗址开展的大遗址研学为案例, 总结了研学实践的7种类型, 并对各类研学进行了比较分析, 试图为大遗址研学开辟新路。通过对五年多馆校合作实践的总结与思考, 在目前我国大遗址保护政策背景下, 以较为成熟的馆校合作模式实施大遗址研学是大遗址开展社教工作的有效模式。

关键词: 馆校合作 大遗址 考古遗址公园 中小学研学 齐国故城

Abstract: The museum study tour in term of museum school cooperation have developed for nearly 20 years, and the field trip of complex sites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part of museum study tour. This paper takes the complex site field trip carried out at the ancient city of Qi in Linzi as a case, summarizes seven types of research practice, compares and analyzes all kinds of research, and tries to open up a path for the complex site field trip. Through the summary and reflection on the practice of museum school cooperation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under the national background of complex site protec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lex site research and learning with a more mature museum school cooperation mode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social education of complex sites.

Key Words: Museum school cooperation; complex site;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y tour; ancient city of Qi

新时代下优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与输出成为文化热点和社会新风尚, 各

类文博场馆自然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中小學生天然地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文博单位和学校作为传播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大主体，馆校合作研学模式成为开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学旅行的主要模式。我国的大遗址保护概念自1997年^①提出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不同类型的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陆续建成开放，近年来成为中小学研学的目的地。大遗址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理应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研学基地。

一、大遗址研学与博物馆研学的差异

博物馆和大遗址属于互相交叉又有区别的文化资源。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对博物馆的定义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博物馆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②。大遗址是建立在遗址概念基础上的相对概念，系中国独有，目前尚未有统一的定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徐光冀认为：“大遗址指面积大、文化内涵丰富、学术价值高，对研究古代社会有重要意义的遗址。其种类有聚落、城镇、宫室、建筑群（含园林）、寺庙（含石窟寺）、手工作业作坊、工程、陵寝和墓葬群等，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

周婧景认为“博物馆研学”是由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学校、博物馆或社会机构有计划地组织安排，中小學生通过集体参与的方式，在博物馆场景中开展的，将研究性学习与旅行体验进行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2]。博物馆研学在我国已经发展了近20年，传统的场馆类博物馆研学日臻成熟，大遗址研学正在成为我国博物馆研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大遗址自身特质又与传统博物馆有别，故大遗址研学有其独特性。北京大学孙庆伟认为：“我们过去在博物馆看文物，很多大遗址正是这些文物的原发现场。可以把大遗址看成是一个更大的‘物’，它提供了文明发生的环境、空间和各种关系，可以让民众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文明。”^[3]

博物馆和大遗址都是优质的研学教育资源，从教育活动的角度来看，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源在“受关注点”“建筑空间”“自然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表1），使得以其为载体开展的研学从源头产生差异。

1. 关注点差异

博物馆以“物”吸引观众，学生关注点在馆藏可移动文物、化石标本、艺术品等单体藏品。研学活动以馆藏自身蕴含的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来激发学生的探索求知欲。

大遗址不单有“物”，更有“物”存在的环境（包括历史环境和现存环境）。大遗址的类型丰富，范围广大，多以不同历史

表1 大遗址与博物馆资源差异

	受关注点	建筑空间	自然环境
博物馆	可移动文物、标本、化石、艺术品等陈列展品、藏品等“物”	大体量的城市公共建筑空间及其附属的公共设施	以人工环境为主
大遗址	人类遗物或遗迹，及其存在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环境	大面积的乡郊遗址及局部小体量的遗址保护场馆	开放性的，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区域，呈现原生的自然风貌

① “大遗址”始见于1997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在这一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大型古文化遗址”的提法。

② 国际博物馆协会2022年8月24日在布拉格举行的第26届ICOM特别大会上通过了新的博物馆定义。“A museum is a not-for-profit, perm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that researches, collects, conserves, interprets and exhibits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pen to the public, accessible and inclusive, museums foster divers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ey operate and communicate ethically, professionally an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ies, offering varied experiences for education, enjoyment, reflec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时期人类活动原发地为主,价值多样,有古文化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群等,甚至可以说是博物馆馆藏文物或标本的原产地。大遗址研学可以用地理单元或某种文化类型吸引学生的兴趣,以时间和空间的广度拓展学生的研学空间。

2. 建筑空间差异

国内外的博物馆大多在城市中心,甚至是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其建筑外形独具特色,建筑体量和空间比一般公共建筑更大。

大遗址多在城郊或乡村,面积往往以平方千米计算,一处可研学的大遗址包含了遗址博物馆、考古发掘保护棚、遗址本体保护建筑等,呈现了自然状态下的遗址遗迹。因遵循“最小干预”和“建筑式样与遗址历史风貌协调统一”等保护展示原则,多数遗址上的现代建筑体量较小,面积一般在1000平方米以下,外观高度低于10米。

3. 自然环境差异

博物馆是封闭或半封闭性的建筑,研学活动几乎全部处在现代的人造空间和园林景观中,研学者无法感知时间、温度、湿度、天气、季节等诸多环境因素的变化。

大遗址作为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区域、遗物遗迹原生地,研学活动与山川环境、季节变化、河流湖泊、风土人情密不可分,其趣味性和综合体验感更佳。

目前文博界对大遗址研学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性理论成果,其实践大多是在博物馆研学基础上的探索。基于以上几点浅显的认识,笔者在临淄齐国故城遗址(以下简称“齐国故城”)开展研学时进行了区别于博物馆研学的设计和尝试。

二、齐国故城馆校合作研学优势

临淄齐国故城作为先秦时期齐国都城遗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是齐鲁文化起源与发展的重要物证。2013年12月临淄齐国故城被国家文物局批复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位^[4],2017年1月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指挥部成立,随着遗址保护展示工展的进程也开启了齐国故城大遗址研学的实践探索,其开展大遗址研学的优势如下。

第一,文化资源优势。临淄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都城及汉齐王城长达800余年。春秋时,桓管改革,“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时,“临淄甚富而实”,为战国七雄之一。西汉时期,临淄为齐王都府,经济十分发达,“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5],为汉“五都”之一。厚重的历史为临淄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名人,其历史见于诸多典籍。

第二,遗址资源优势。齐国故城是我国规模最大、保存完好的先秦古城之一,由大城和小城两部分组成。城内外遗存密布,城内有桓公台宫殿建筑基址群、大城西墙排水道口等水利设施遗址、铸镜作坊等手工业遗址群、河崖头墓地5号“甲”字型大墓等贵族墓葬群。城外还有遄台、梧台、雪宫台等众多历史建筑台基遗迹。齐故城和后李遗址、桐林(田旺)遗址、田齐王陵等重要遗址,构建了一条以齐故城为中心,从史前一直延续至近代的文物古迹链条。

第三,教育资源优势。临淄区有学校66所,其中九年一贯制学校9所,初中学校15所,小学36所。在校初中生22674人,小学生26762人,全区共有专任教师5170人^[6]。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给临淄的中小学赋予了独特的教育品牌,中小学校名都运用了齐文化符号,有以历史名人命名的“太公小学”“晏婴小学”“管仲小学”“桓公小学”;还有以历史遗迹命名“闻韶小学”“稷下小学”“雪宫中学”“遄台中学”等。

第四,研学体系优势。临淄教育部门完善研学旅行机制,一是盘活人力资源,从博物馆等研学基地聘请优秀的讲解员做实践教师;二是探索各学段研学旅行“一卡通”评价体系,实现学生研学旅行管理信息化和大数据评价;三是多形式、多渠道筹措研学经费,形成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共同出资的研学旅行经费保障机制。同时配套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学习社会实践教育的指导意见》和《临淄区开展中小学生学习旅

行试点工作方案》，绘制形成了《临淄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践基地版图》，打造以齐国故城研学为代表的六条“齐文化+”示范性研学旅行精品主题线路。

三、齐国故城研学实践

传统的博物馆研学多在室内进行，有相应的研学课堂等配套设施，而齐国故城的研学活动是以考古遗址为背景展开的大遗址研学。遗址博物馆、考古现场、野外遗址本体成为研学的主场地。2017年以来，齐国故城结合中小学生实际和素质教育诉求，与临淄本地学校联合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研学活动。

1. 参观研学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作为学校的“第二课堂”或“课外实践基地”，临淄的中小学形成了定期参观的惯例，以学校为单位分批次到齐国故城进行参观游览。

这一传统的研学类型以学生参观“齐国历史陈列”、讲解员配合讲解的方式，使学生了解家乡历史和齐文化。为此，博物馆专门撰写了中学生版和小学生版讲解词，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拉近与中小学生的距离；学校定期（寒暑假）选拔一批中小学生，与博物馆合作培养为“小小讲解员”或“博物馆志愿者”，由他们为游客提供讲解服务，从而加深双方对齐文化的了解。通过馆校联合办学的方式，开设“博物馆课堂”，把馆藏文物作为教具，博物馆展厅作为教室，为学生讲授文物的基本常识，述说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

2. 徒步研学

齐国故城遗址范围达16.8平方千米，城墙总长度达21.433千米（约等于半程马拉松）。博物馆、殉马坑、湍台、晏婴墓、孔子闻韶处、西天寺等遗址遗迹散布在齐国故城的各处，以点串线策划文体结合的研学活动不仅能加深对遗址地理位置了解，同时还能磨炼学生们的意志品质。

位于齐国故城附近的齐都中心小学、临淄三中、稷下中学等学校以优越的地理位置持续开展长距离徒步和文物遗址考察相结合的研学活动。例如2018年秋季的“邂逅齐·迹”和“脚步丈量齐故城”等主题的徒步研学就收到了很好的反响。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专门设计了徒步研学路线。路线1：博物馆—西天寺—桓公台—城垣遗迹—晏婴墓—排水道口—殉马坑—孔子闻韶处—三士冢—学校，徒步总里程16千米；路线2：博物馆—孔子闻韶处—晏婴墓—城垣遗迹—桓公台—西天寺—临淄县衙大堂—学校，徒步总里程9千米（图1）。

3. 考古研学

2017年以来，为配合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山东省



图1 临淄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徒步研学路线示意图

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齐国故城连续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开展了小城北门、大城南墙、大城西墙、稷下学宫等考古发掘项目。考古发掘现场是齐国故城内优质的研学资源,同时也是最好的历史文化传播素材。2017—2020年,齐国故城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在当年发掘中期和收尾阶段进行了公众考古开放周活动,齐故城考古队设计了考古学基本知识普及、洛阳铲等考古工具体验、陶片拼对、地层认知等研学内容;由考古队长担任研学老师,在考古发掘现场讲解什么是遗址、遗址的价值、遗址的保护等相关内容。2020年以后,齐国故城考古队尝试将公众考古开放周拓展为日常开放,凡进入考古现场的研学人员在做好人员登记后在开放区域进行有序观摩,考古队员和技工负责引导学生研学。



图2 2018年首次进行线下研学的网络直播

4. 网络直播研学

在媒体融合发展的时代,5G技术普及,这开启了文化传播的新媒体时代,同时也扩大了研学的普及范围。

2018年暑假,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联合淄江中学开展的“齐文化遗址考察”研学旅行就首次采用了线下研学与线上同步直播的方式进行,由经过培训的学生代表和齐文化专家在桓公台、营丘城址、稷下学宫遗址等代表性遗址以现场访问、解说的形式进行“研学直播”(图2),解读遗址内涵和价值,同时线上和网友互动交流,线上观看人数达到近5000人,远超每次实地研学承接100余人次的规模,极大地拓展了研学的传播范围。

2020年以后,家长和学生通过“抖音”“斗鱼”“哔哩哔哩”“小红书”等应用程序对齐国故城研学进行网上直播,使参与研学活动的个体成为“传播源”。

5. 竞赛打卡研学

竞赛游戏一直是青少年群体比较喜欢的一种寓教于乐活动,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尝试设计将这种方式融入研学中,将齐国故城内的遗址点作为打卡点,设计了“齐城地图”。同学们在一定时间内按照地图到各个遗址点进行实地打卡,并现场完成竞赛“任务”,比如在桓公台需回答与桓公台相关的历史典故或成语;在排水道口需回答齐国故城排水设施的功能构造等。打卡并完成任务后会获得相应的得分奖励和标志收集,最后依据得分高低来判定竞赛的输赢。

打卡竞赛研学不仅可以以学生个体为单位,也可以以小组或家庭为单位进行;不仅增加了研学的趣味性,还拓展了研学的深度和广度。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也有学生和家长甚至手绘了“齐故城打卡攻略”。为保证研学的质量,淄江中学等学校将暑期的“齐故城打卡竞赛分值”纳入社会实践考核。

6. 情境演出研学

齐国历史上姜太公、齐桓公、管仲、晏婴、齐威王、孙臧、孙武等名人是珍贵的人文资源。这些历史人物留下的传说故事和成语典故也是珍贵的研学资源。

历史人物+历史故事+历史遗迹就构成了一个可演绎的历史场景,例如:“田忌赛马”的故事和成语“和而不同”的发生地就在遄台遗址。稷下中学在齐文化专家的指导下组织学生在遄台遗址演绎“田忌赛马”“和而不同”的历史短剧。穿越千年时空,在相同

地点再现历史名篇，通过这种角色扮演的
方式加深孩子对历史传说、成语故事、历
史人物的理解；情景再现更有带入感，更
能直击人心，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文化的
种子。淄江中学曾组织学生在桓公台遗址
演绎“一鸣惊人”“讳疾忌医”的历史短
剧；闻韶小学组织学生在“孔子闻韶处”
演绎“三月不知肉味”“尽善尽美”的情
景剧；临淄三中组织学生在“三士冢”演
出“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7. 沉浸体验研学

青少年普遍对高科技、新技术有极
大的兴趣，齐国故城在建设齐国故城考
古遗址公园中将弧幕电影、VR虚拟现
实、AR增强现实、CAVE沉浸式体验系
统、通电玻璃混合成像、裸眼3D等高科
技新媒体手段应用于遗址展示，充分地
将视觉体验与沉浸体验有效结合，进而
达到更好的传播与展示效果^[7]。这些科技
体验资源成为研学活动的热门，使学生对
文化场馆更加亲近。沉浸式的研学通过
置身科技营造的虚拟空间，深度还原历史
背景、沉浸体验历史故事、穿越融入历史
场景、深度阐释遗址价值，让参加研学的
学生对遗址的理解从被动到主动、从旁
观到亲历、从闭眼想象到身临其境。

四、分析与收获

馆校合作模式的大遗址研学活动，需要组织者（校）、实
施者（馆）、参与者（学生）三方的参与。通过上文所述的研
学实践，笔者对研学活动的三方进行反馈调查，从适宜人数、
校方投入、馆方投入、活动开展重复率、研学前的兴趣指数、
研学后的获知感等几方面进行了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综合表2看，传统的参观研学社会认可度较好，馆校合作成
熟，在博物馆学习成为惯性，由此也出现了“兴趣疲劳”。文
体结合的徒步研学，各方保障度较高，学生的“期待值”高，
但研学时长较长加之学生体质体能的因素，研学后的获知感一
般。以考古体验为主的研学，对学生的吸引力最大，获取知识
量大，但可能因为专业度较高，可认同的获知感并不高。网络
直播的研学课程，由于极大的便捷性和接受度，学生兴趣度和
重复率很高。竞赛打卡的研学能激发学生的“上进心”，也因
为有明确的“任务”，学考结合，目标性学习强，知识量大，
但毕竟胜出者少，重复率不高，可以探索更加合理的分值及赛
制。情境演出研学，参与人数受限、前期准备投入较大，虽更
易引起关注，但获得认同感较低。沉浸体验研学，体验感强、
认同率高，只需前期一次性投入，知识可视化强，获知感高，
但受设备限制明显。

在实际的研学活动中，在同样的成本和人力投入下，多项目
交叉组合的研学活动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例如：角色扮演+网络直
播；徒步+打卡竞赛；传统参观+沉浸体验；考古体验+网络直播，
这些组合的研学活动既能有效利用资源，又能减少成本投入，达
到的研学效果也较好，是一种“性价比”最高的研学方式。

表2 齐故城研学类型调研分析表

	适宜人数	研学时长 (分钟)	校方投入度	馆方投入度	重复率	兴趣度 (前访)	获知感 (后访)
传统参观	20—100	45—90	★★	★★★★	★★★★★	★★	★★★★
徒步研学	50—100	90—240	★★★★★	★★★★	★★	★★★★★	★★
考古体验	20—50	45—90	★★★★★	★★★★★	★★★★	★★★★★	★★★★
网络直播	无上限	0—60	★	★	★★★★★	★★★★	★★★★★
竞赛打卡	50—100	90—180	★★★★	★★	★★	★★★★	★★
情境演出	10—20	60—90	★★★★★	★★★★★	★	★★★★★	★
沉浸体验	5—10	5—15	★	★★	★★★★★	★★★★	★★★★★

从参加研学前后的学生问卷调查来看,因为研学前对活动认知不足,研学前的兴趣度和研学后的获知感出现“倒挂”现象。一是因为馆校双方对大遗址研学的经验都不足,研学前虽然有调研和沟通,但对在自然空间下研学活动把控不足,尤其是徒步研学、打卡竞赛、情景演出这类户外活动占比高的研学。二是因为在研学课程和研学方案的设计方面,还是按照传统博物馆研学的思路,没有充分考虑大遗址自身的特性,大遗址“广阔天地”的优势未能充分发挥。三是因为学生对大遗址研学的心理准备不足,很多学生认为大遗址研学就是“踏青”“郊游”,“玩”的心态较重,忽视了“学”才是主要目的。

在齐国故城研学中,临淄淄江中学组织的固定活动,暑期“齐文化遗址考察”研学,经学生、家长、老师多方反馈,研学效果和社会反响较好。总结来看:一是学校把大遗址研学作为暑期实践的必备科目,老师和家长重视程度高,学生准备充分;二是学校和馆方沟通充分,经多次实地模拟演练后设计专门针对这一学校的课程方案,预案细致周到;三是活动总结及时,每年都会在研学结束后召开座谈会邀请各方参与提出意见和建议,在下一年度的研学中进行修正和完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相比博物馆研学,大遗址研学更适合开展系列或延续性活动。每处大遗址应充分考虑自身遗址特性和环境特质,量身定制研学课程和研学计划,馆校双方要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设计研学预案。

基于大遗址的遗产性质,研学方案的设计不仅要考虑学生的智力因素,还要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学生的体质因

素,同时做好研学前的预热,充分调动学生们的热情和兴趣。做到以上几点,才能达到“文化传承”“遗产传承”的目的。

五、关于大遗址研学的思考

馆校合作模式,是文物资源单位和学校在学生社会教育方面的深度合作。是政策推动、市场驱动、教育需求下的多方资源整合。齐国故城与中小学合作开展研学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大遗址研学有几点思考。

首先,文物保护是开展研学活动的前提。大遗址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中小学研学活动中,大遗址保护机构不仅要加强对遗址本体尤其是脆弱遗迹的保护监测,特别要注意人类活动对大遗址的影响;同时要普及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和基本常识。对研学活动加强人防和技防监控,避免因孩子的“好奇”或“好动”对遗址本体产生不可逆的破坏。

研学是群体性活动,参与人数较多,为保证研学质量,一般可采取预约制,寒暑期可实施高峰限流或错峰研学。此外,要充分做好研学前期预案,在研学前通过学校发放《研学须知》或《文物保护提示》等方式进行提前干预。

其次,要突出大遗址独特的资源优势。大遗址之所以受到学校和学生研学的青睐,是因为大遗址作为文化遗产的资源独特性,以及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研学不仅可以研文化、学文物,还可以舒身心、松精神。大遗址保护机构要突出遗址文物资源优势,通过常年开展的考古活动和展览活动,把文化属性的标签贴牢、贴实。

研学活动要与遗址所在地的现实环境相适应,民居建筑、地方风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色地域文化都可以植入研学中,丰富大遗址研学的内涵。大遗址保护机构可以与当地园林、农业等部门合作,充分利用遗址土地、优化自然环境,还可以将自然资源作为研学附加资源予以统筹利用,开展更多活动。例如:西安汉阳陵的“银杏季”、无锡鸿山遗址的“葡萄节”、安阳殷墟遗址区的“油菜花海”等,把大遗址地上地下的资源优势最大化。

再次,要最大化阐释大遗址价值或内涵。大遗址要对室内建筑空间集约利用,做好遗址博物馆或展示中心的基本陈列展示。同时应丰富遗址本体和考古现场展示手段,活化遗址现场标识,注重历史氛围营造和场景融合展示,大胆应用科技手段复原历史场景。新技术新媒体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日臻成熟的VR、

AR技术和5G+APP时代的到来,突破了大遗址研学展示壁垒。5G全覆盖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通过“5G+AR”试衣镜、“5G+MR”全息文物、“5G+MR”沙盘、“5G+MR”眼镜、“5G+VR”博物馆等全新应用,让体验者感受到“活着的”良渚文化^[8]。齐故城的CAVE沉浸式体验系统和“Roomage遗址场景复原展示平台”,以及线上研学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和突破。

最后,大遗址研学需要专业的人才队伍。我国的大遗址保护机构一般为遗址博物馆、文物管理所或考古遗址公园。这些机构在人员配备上往往编制不足、专业化程度不够,有的甚至“一人多岗”“一岗多责”。大遗址保护机构其一是要加强编制内专业人才引进和员工专题培训,建设专业化文博研学队伍作为大遗址研学的主力部队。其二应充分利用馆校合作中校方师资,培训老师及家长成为“准文博”人才,建成大遗址

研学的“友军”。其三应充分利用常驻大遗址的考古队、文保队、专家团等建成大遗址研学的“后备军”,有效补充大遗址研学人力资源。

此外,应与开设考古、文保、文博专业的高校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吸收高校师生加盟大遗址研学团队,为大遗址研学注入新鲜活力的“青春血液”。

六、结语

大遗址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随着大遗址保护的持续深入,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在各地兴起,大遗址研学活动日渐丰富,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中要求:研学围绕大遗址考古和价值内涵研发一批普及考古和文物保护知识、强化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兼具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的研学实践活动课程;增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大遗址现场的中华文明体验感^[8]。这在顶层设计上为我国大遗址研学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大遗址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齐国故城在大遗址研学实践方面尚有不足,下一步将继续探索大遗址研学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其他大遗址开展中小学研学活动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 [1] 徐光冀. 大遗址保护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N]. 中国文物报, 2016-2-26(5).
- [2] 周婧景, 郭川慧. 博物馆“研学旅行”定义及其理解[J]. 博物院, 2020(5): 94.
- [3] 孙庆伟. 让大遗址成为社会共享的文明课堂[N]. 人民日报, 2022-2-26(7).
- [4] 国家文物局. 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的通知: 文物保发〔2013〕19号[A/OL]. (2013-12-31)[2022-06-30]. ncha.gov.cn/art/2013/12/31/art-2237-42412.html
- [5]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63.
- [6] 临淄区委党史研究中心, 临淄区地方史志研究中心, 临淄区档案馆. 临淄年鉴(2021)(教育 体育)[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2: 259-261.
- [7] 于焱, 毕恭. 沉浸体验科技在考古遗址公园的探索与实践[N]. 中国文物报, 2021-12-10(5).
- [8] 薛帅. “亮”起来、“活”起来、“用”起来——大遗址有大未来[N]. 中国文化报, 2021-2-4(8).
- [9] 国家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的通知: 文物保发〔2021〕29号[A]. 2021-10-12.